英国的绿色文化

□沈 凌

但凡去过英国的人，对英国环境的直观感受都可以用一个字来形容——绿。绿色，恐怕也是当下英国最流行最时髦的词汇了。在英国，它已经不单单是指简单的颜色，经济、政党乃至和生活息息相关的住宅、食物、交通、学校、婚礼，都可以被冠上绿色的标签。而英国也自然而然成为了绿色文化的典型代表。

英国在环境立法上走在了世界的前列，也引领了整个世界绿色革命的发展。英国的绿色文化的推广和发展还得益于英国一直以来在绿色政策、绿色理论和绿色实践上的不断创新。除了宏观的绿色经济调控，政府也在民众绿色生活规划方面有许多创新。例如，英国对新建的住宅区有着严格的规定，除了有对可再生能源的要求外，还提出了许多“绿色指标”——大到小区的每一棵树，每一片屋顶草坪，小到每一个鸟窝，甚至是一株绿植，都有相应的生态价值标准，而只有达到了评审机构的生态评分标准，建筑商才能获准施工。可以说，英国在绿色政策和理论的创新上也走在了许多国家的前面。

绿色文化的形成显然需要依靠生态文明的法制建设，需要依靠政府的正确引导和有力推动，但是也要依靠人们的生态文明意识和自觉行动。在英国，节俭、环保、低碳、健康的绿色生活方式已经成为了一种时尚、一种理念。不难发现，这些绿色理念就体现在英国人衣食住行的方方面面。

从穿着上来讲，英国人崇尚节俭、方便和实用的原则，除非正式场合，平时的穿着都以舒适简单为主，并不过分讲求排场，也不排斥二手服装。很多人都会把自己穿不了的旧衣服送到慈善商店进行义卖，也会到这些二手商店购买二手服装和物品。

在饮食上，英国人崇尚简单实用，他们的饮食习惯也和绿色生活理念不期而合。首先，从食物的选择上来说，英国人的食材相对简单，他们不吃野生动物，甚至连淡水鱼都很少吃。这就有效地保护了英国当地的野生动物。在超市中，虽然有机食品比普通食品高出不少价钱，但英国人也愿意多掏钱来购买这些绿色食品。其次，在饮食教育上，孩子们从一两岁左右就开始接受餐桌礼仪教育，学会不要浪费，笔者在伦敦的房东的 3 岁儿子每次都会认真地将自己碗里的每一点食物都舔干净，如果有实在吃不完的东西他就会问母亲是否可以拿到花园里去喂鸽子。在他小小的心灵里环保意识已经在扎根了，这是多么让人欣慰的事情。

谈到英国的住宅，有两点不得不提。其一是“老”。英国人崇尚古朴，崇尚历史，因此，越是年代久远的建筑，他们越是觉得珍贵。再加上英国土地基本都是私有制，因此，很多英国人的房子都是祖辈们留下来的，他们也以能够住在这样有历史的房子里为荣。笔者在英国租住的房子就有一百多年历史，而房东告诉笔者这在附近的小区还算不上老房子。留意观察的话，英国的城镇中很容易找到许多保存完好的古老建筑，英国人对古建筑的保护和利用也有效地避免了新的建筑垃圾的产生。其二就是“绿”。英国大部分居民都愿意选择住在连栋或者独栋的二层或三层楼房里，对他们而言，房子面积大小不重要，最重要的是一定要有花园，多数楼房前后都有花园，并且这些连栋的房子往往是用花墙或是灌木篱笆隔开。英国人是极其重视园艺和园中绿地的，如果花园中有裸露的土地或是杂草丛生，访客们则会对这家的主人留下极不好的印象，因此，每个英国家庭都会花很多时间和精力来打理自己的花园和花墙，这样一来，他们在装点自家门面的同时也美化了周边的环境。居住在乡村的居民就更不用说了，他们大多数都会自己种植家庭所需的蔬菜瓜果，怡然自得地过着自给自足的田园生活。



说到出行习惯，英国一直倡导低碳出行。英国人虽然几乎家家都有私家车，但上班族们更乐意选择公共交通出行。一是因为英国有着完善的公共交通系统和配套措施。在过去的十多年中，政府对公交服务的投资增长了一倍多，英国境内的公交使用也在逐年增加。同时，政府也鼓励自行车出行。英国在全国范围内投资建立了 18 座自行车示范城镇，几乎所有的道路都有单独的自行车道，政府还提出了高达 500 万英镑的行动计划来改善全国主要地铁站的自行车存储条件。以伦敦为例，在市区内，一两公里范围内就能够看到一个自行车租赁站，使用后的自行车可以退还到任意一个租赁站，因此自行车也成为了伦敦市民和游客短距离出行的首选。二是因为在政府和社会组织长期的倡导下，人们的出行理念也在不断变化，步行和自行车出行已经被很多人视为最健康最低碳的出行方式，所以即便路途较远，一些人还是愿意选择自行车作为出行方式。

英国人享受到了绿色文化带来的回报，看到了绿色经济发展的潜力，也就更愿意在实践中不断坚持绿色的发展方向。更多的时候，不需要法律的约束，英国人已经能够自觉地进行严格的垃圾分类，有机地在花园中进行种植，在住宅中做到节能和环保，尽可能减少房屋的碳排放。正是这些绿色的理念让每一个居民，都尽己之力，一点一滴地改善和维护着周边优美的生态环境。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英国人宁可把自己国家的树木碾成粉末埋在地里，也要高价从国外进口纸张；为什么宁可花高价钱重新装修和维护自己老房子，也不愿意拆掉重建；为什么宁可让成片的土地绿草丛生，也不愿意将其开垦成经济田地或是住宅小区。因为，在他们心中，已经开垦出了一块绿地。

在英国，随着绿色文化的兴起，崇尚自然、保护环境、维持生态平衡、减少资源消耗、促进可持续发展的绿色时代已经到来。英国绿色文化的欣欣向荣得益于政府和社会团体多年来不遗余力地环保宣传和积极态度，并将随着日新月异的绿色理念和绿色技术而不断发展，但最重要的，还是源自于英国人发自内心的对大自然的热爱和对绿色的向往。

文化视野

郭沫若与《兰亭序》

□李秀潭

在笔者收藏的名人墨宝中，有两轴郭沫若行书八言联。

对联上联为：谋在于众，断在于独；下联是：用之则行，舍之则藏。落款郭沫若，下钤篆书“郭沫若”白文印，“鼎堂”朱文印。

郭沫若，号鼎堂，是 20 世纪中国学术文化大师和“百科全书式”的文化巨匠（周扬语）。他不仅在诗歌、戏剧、小说等方面开拓了一代新风，而且在历史考古、甲骨文、金文等古文字研究诸方面也有特殊贡献。与近代国学大师罗振玉（号雪堂）、王国维（号观堂）、董作宾（字彦堂）合称“甲骨四堂”，极一时之盛。他还是尝试用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国古代史的第一人。

郭沫若学识渊博，才华卓著。他自幼习书取法欧（阳询）、褚（遂良）、颜（真卿）、柳（公权）、苏（轼）各体，汇而为一，形成雄健洒脱、气韵生动的“郭体”，体现了中国书法艺术的美感和豪气，在当代书坛独树一帜，为世称誉。

郭沫若不仅钟情于书法艺术实践，而且注重书法理论研究。1965 年夏，我国文坛上就晋代大书法家王羲之所书《兰亭序》真伪进行的一场大辩论，主角就是郭沫若。

《兰亭序》是东晋书法家王羲之在三月三传统修禊日，为当时名流“曲水流觞”雅集作的序。临流一序，熠耀千古。“天下第一行书”就此诞生。《兰亭序》全篇 324 字，28 行，文辞优美，书法精绝。序中凡是重复的字个个不同。其中 20 个“之”，变化迥异，无一相类。作者对人生问题、生死大事的深层思考，化作笔下刚柔相济、飘逸灵动的线条。透过那不激不厉、温文娴雅的笔触，我们仿佛看到了晋人落拓不羁、风流潇洒的奕奕神采和翩翩风度。《兰亭序》是王羲之神闲务逸、心手相应、即兴发挥的神来之笔。他对此十分珍爱，作为家珍代代相传。直至传到第七代智永和尚的徒弟辨才，被唐太宗派监察御史萧翼骗走，最后陪葬昭陵。并由此引发人们长久探寻的兴趣和数不清的是是非非、恩恩怨怨。

1965 年 6 月，时任中国科学院院长的郭沫若在《文物》杂志发表了一篇《从王谢墓志出土论〈兰亭序〉的真伪》一文，之后《光明日报》转载。该文认为，从当时南京出土的王谢墓志（晋代）来看，《兰亭序》失去了晋人惯用的带有隶书笔意的笔法，因此断定它不是晋代遗留下来的作品。其次，从文章内容看，文章前半部描写欢快之情，写得很流畅，后半部突然悲痛起来，与晋人达观以及王羲之本人性格大相径庭，作者是否是王羲之值得怀疑。再者，《兰亭序》开头，“岁在癸丑”的“癸丑”二字，像是后人加上去的。据此，郭推断《兰亭序》是一赝品，并非王羲之所作。

郭文发表后，江苏省文史馆馆员、书法家高二适不以为然，写了篇《〈兰亭序〉的真伪驳议》与郭争论。该文认为，唐初大书法家欧阳询、虞世南等都在学王帖，唐太宗也酷爱王之书法，后人没有理由否定唐初书家的鉴别能力。其次，若以东晋书法当接近于隶书，而《兰亭序》却行书，因此就怀疑《兰亭序》非晋之作，这是方法论的错误。因为王字本身有个发展过程，它脱胎于旧时代而又高于旧时代，向行书方面发展，故能称之为“书圣”。再者，从美学观点看，《兰亭序》书法，文思之潇洒、飘逸，与东晋士族风貌也相吻合。从上所述，高文认为《兰亭序》仍是王手笔，并非后人伪作，观点与郭文针锋相对。

然而高文写好后，没有哪家报刊敢于刊登。原因在于郭是学术界泰斗，且郭文中又援引时任中央书记处书记康生的观点为同调，更令人望而生畏。高在一筹莫展之时，就把文章寄给中央文史馆馆长、抗战时期重庆诗友章士钊先生。章看后，认为高二适专攻章草，善察笔势，精于鉴赏，故赞同高的观点。遂后并把高文推荐给毛泽东“评鉴”，以求“得以公表”。毛泽东看过高的文章，复函章士钊说：“高先生评郭文已读过，他的论点是地下不可能发掘出真、行、草墓石。草书不会书碑，可以断言。至于真、行是否曾经书碑，尚待地下发掘。但争论是应该有的。我当劝说郭老、康生、伯达诸同志赞成高二适一文公诸于世。”同日，毛给郭发去一信，内云：“笔墨官司，有比无好。”在毛的亲自关怀和支持下，《光明日报》和《文物》杂志均先后刊发高二适《〈兰亭序〉的真伪驳议》一文和影印手稿。郭针对高文再次发表了《〈驳议〉的商讨》和《〈兰亭序〉与老庄思想》两文，与之辩论。尔后，高也再次写了《〈兰亭序〉真伪之再驳议》一文，回敬郭沫若。由于领导重视和鼓励，在全国学术界很快呈现出一派“百家争鸣”的繁荣景象。当时参加争论的学者除郭、高二位外，还有龙潜、启功、赵万里、史树青、沈尹默、严北溟等。肯定派以高为首，否定派以郭为首。两派争论不休，但因双方都没有充足证据，故此争论最后也没有结论。

岁月悠悠。关于《兰亭序》真伪的争论已过去近半个世纪。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反映出那个时代的社会思潮和文化动向。近年来，臧否历史人物之风甚盛。正像所有名人一样，郭沫若的生平是非，千秋功过，人们评价也是见仁见智，毁誉不一。但是当年郭以学者身份，平等地参与讨论，不以势压人，所体现的百家争鸣的学术民主之风，还是应该值得肯定和弘扬。

文化长廊

感受台湾高铁的“慢节奏”

□郑 重

台湾高铁贯穿宝岛西部，连接台北、新竹、台中、台南至高雄等 8 个车站，设计时速达到 300 多公里，从台北到高雄仅需一个半小时。高铁沿线各站可轻松接驳到达日月潭、阿里山和台湾南部恒春半岛的垦丁等诸多旅游胜地，沿途还可以欣赏美丽的宝岛风光，已经成为不少游客台湾旅游的首选交通工具。在乘坐高铁的过程中，不仅没有感觉到由科技快速发展带来的焦躁不安，反而体验到愉悦宁静的“慢节奏”。

和大陆高铁一样，台湾高铁票也可以在其官方网站提前购买。但台湾高铁设有“早鸟计划”，购票的时间越早，价格就相对越便宜，这对能够提前安排自己行程的乘客是一项很好的优惠政策。一般而言，台湾高铁官方网站会在乘车日前 28 天开始发售车票并提供限量的早鸟优惠，不同时期的折扣率不同，较低的有 6.5 折到 9 折，9 折售完便是原价票。高铁票在网上预订好后可以在遍布台湾大街小巷的便利店直接打印，非常便利。

从台北出发，发现台北车站并不高大宏伟，甚至略显陈旧，但干净整洁、秩序井然。台湾高铁的售票员服务态度非常亲切、耐心，始终面带微笑，给人一种“顾客就是上帝”般被尊重的感觉。售票员特有的台湾腔，以“哦、哟、啦、呀”结尾的拖音，不紧不慢中透露出一种娴静和淡然——“请问您到哪里呢？”“最早的一班是两点哟，您看几点合适呀？”排队的乘客没有急不可耐的焦躁，都能耐心淡定平和地等待。购票完毕，售票员把买好的车票和找零的钱款都放在小塑料盘中，稍稍起身，面带微笑双手端出，人性化的服务态度让游客备感亲切。对比大陆的一些买票想插队、上车要靠前、吃饭要抢座、慢点就发飙的“急人”，一方面固然是因为资源的有限，但同时也是心态的过于焦虑。

经济发展、科技进步使人们生活更便利，但并不会必然提升幸福感，速度的提升也使人们失去了很多“慢节奏”的乐趣。快捷的Email让很多人无法体会翘首期盼邮递员送来远方邮件的欣喜，日行千万里的飞机、高铁让很多人难以再感受慢速火车结伴而行、边走边看的快乐。经济高速发展甚至可能使人们急功近利、内心狂躁，精神无所归依：打电话 3 秒无人接听就急躁不已，1 分钟刷一次微博，1 天看几百次微信，否则就无法忍受孤独寂寞。其实所有的科技发展都只能回答一个问题：如果我们希望在技术层面支配生活，我们应该怎么去做。至于我们是否应该以及是否真的希望在技术层面支配生活，和这样去做是否幸福快乐，则完全无法回答。科技发展带来的高速和高效没能安抚人们狂躁的心灵，慢下来、静下来才能触摸到自己的内心，才能活得真实、踏实。台湾高铁售票员与乘客的“慢节奏”和井然的秩序，让人感受到内心的平静和安宁。

台湾高铁车厢非常干净，无人高谈阔论，肆意聊天喧哗，接听移动电话也频频顾目四盼恐侵犯到他人隐私空间，并多以手掩口，声音如蚊蝇嗡嗡般细小。偶有孩童吵闹，父母多会立即制止。每个人都尽量自觉约束自己在公共场所的言行，体现出对他人的尊重。列车员、服务员态度严肃认真，目光柔和中透着专注。列车员穿戴整齐如新，走过时面带微笑，频频与乘客目光交流点头示意，似随时准备为乘客效劳，体现出传统中国社会的温良恭俭让，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处世原则。李泽厚先生曾把儒家学说内容划分为政治、伦理、宗教三个层面来解构与重建，其中最能与现代社会相契合的就是其伦理部分，不少现代西方国家也试图从中汲取营养来应对市场经济的人情味缺失。传统伦理中的父慈子孝、兄友弟恭，礼之用和为贵，入则孝出则悌，泛爱众而亲仁的理念体现在人际关系中使人备感温馨。

台湾的公共交通发达，交通枢纽设计人性化，高铁、台铁、捷运、客运站基本都连接在一起，指示标识清晰醒目，转乘非常方便。在服务设施方面，凡乘客能想到的（如哺乳室、残障人士低位电话、夜间女士候车专区、心脏除颤仪等）都能有所安排。笔者到台中后错过了最早一班到清境农场的客运车，需在台中高铁车站等待一段时间。车站客运服务中心一位小伙子主动微笑将沉甸甸的行李箱抬到柜台内免费寄存，还不厌其烦地介绍车站周边值得一去的景点，没有任何厌烦倦怠之感。工作人员这种乐在其中的工作态度，让人感动。游客在一个完全陌生的环境中也没有忐忑不安和焦虑感，无需时时、处处树起警惕提防之心。高铁里很多服务员都是年轻貌美之男女，他们没有显示出对于工作的不满意，也没有把工作当成一种焦虑的负担。无论是高铁便利店的售货员，汽车站的检票员，还是普通保洁人员，他们眼中都透露出安定、祥和，热情地做好自己的本职。心态决定状态，他们可能不会觉得自己“没出息”，而是将快乐当作干好工作的源泉。正如《论语》所说：“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不改其乐。”这种安分守己、恪尽职守是东方儒家文化所特有的。成功在于安乐幸福，在自己岗位上尽心、尽责、尽力。反之，如果单纯以是否发大财、住大房子、当大官为成功标准，这种狭隘的成功观将导致绝大多数人都无法感受到成功的快乐，当社会上大多数人都如此时，整个社会的精神面貌可想而知。

飞速的高铁并没有让人的心态飞起来。快靠的是外在力量和惯性往前冲，慢则需要内心和素养的控制力与平衡力。“慢节奏”也是一种境界：交通工具的“快节奏”和生活情趣的“慢节奏”相结合，人才不至于因为社会、科技高速发展而感到空虚和苦恼。“快乐，并不是来自物质条件的刺激，而是内心真正的安定与平静”，“用感恩的心，用报恩的心，来做服务工作，便不会感到倦怠与疲劳”——高铁站免费赠发的《自在语》中如是写道，这可能是对台湾高铁“慢节奏”的一种最好诠释。

随想录

求同与灭异

□王淦生

余生也早，故而学生时代也就无缘领教今天盛行于各大中小学的所谓“客观性试题”和“标准化答案”。还记得我们当学生那会儿，考试次数既不及现在这般频繁，试题类型更不如今天这样花样翻新。尤其是那些文科试卷，诸如语文，常常只是一则阅读加一篇作文；政史类考试也只是出几道大的论述题，由学生从中任选几道作答。教师阅卷，往往也比较宽松，学生给出的答案只要不出常识性差错，凡言之成理持之有据者，一般都能得到一个像样的分数。尤其是那些观点新颖、见解独到者，即便略显稚拙或是语有偏颇，也大都能够享受到奖分的优遇。因此，同样一道考题，全班几十位同学常常会设计出数十种各领风骚的答案来，大有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之势。阅卷时，同年级教师甚至会因自己学生答案新颖而相互炫耀，那情形，仿佛种下了萝卜却收获到了人参。

对照时下驰骋考场、“风华正茂”的客观性试题，上述试卷在问题设计上免不了或多或少地带有一些主观色彩，在强调“客观、准确、公正”地选拔人才的今天，似乎已显得功力不济，殊难支撑局面了。于是乎，便有高人出现，历览古今选才之举，琢磨中外考试之法，终于创造发明出这种学生易答、教师好批的客观性试题，不少教育考试部门甚至于更进一步，创造出专门用以储备各类试题的题库，遂使得日后出卷如同从冰箱中取菜制作拼盘一般容易。这每一道试题，都会一一配以标准答案；答案既出，自然是顺之者昌，逆之者亡。如此一来，一场考试便常常可以搞得像体检时量身高、测体重一般毫厘不爽，卷面上的小分则更是可以保留到小数点后第二位，客观、公正得近乎上了天平。

早就有人下过这样的论断：考试是教学工作的指挥棒。在应试教育余韵犹存、一切皆以考分论英雄的今天，此语堪称至理名言。什么“素质教育”“创新教育”，什么“开发智力”“培养能力”，只要对教师、对学校的考核、考评机制不发生变革，这些美丽的新名词都只能成为人人口中有、人人心中无的装潢材料，订计划、写总结、摆成绩、谈经验时可以信手拈来，巧作点缀，但没有多少人会真的往心里去。一旦进入教室，这些早就被抛到了九霄云外。而如何让学生去顺应潮流、适应考情，能够在标准答案的夹缝中自由驰骋、出色发挥，这才是当今不少教育者朝思暮想、上下求索的关键性问题。

那些初出校门、从标准答案中冲杀出来的标准型教师对付起这类客观性试题来自然是轻车熟路不在话下，而类似于我等旧时代过来的主观派对此便颇有几分不适之感乃至很有几分抵触情绪。然大棒在后，重任在肩，由不得你有丝毫的闪失和迟疑。于是，首要措施便是让门生们树立起“罢黜百家，独尊师说”之观念。而为师者亦不敢自由发挥说走了嘴，只能以考纲为经典，奉教参若神灵，一味照本宣科。学生当中但凡有见解独到、观点新颖者，只要与标准答案相左，任其言之有理，持之有故（如答“冰雪融化后是春天”者），也一律以异端邪说视之，一棍子打死，以免“谬种”流传，混淆视听，乱我军心，考试丢分。如此求同灭异的教育方式，还真的造就出了若干在学习上绝对依赖于老师而在考场上却能够驾轻就熟游刃有余的挣分高手。

只是在一天忙碌的工作之余，在送走了一届届学生之后，本该略感轻松的心中却总是平添一份忧虑：一旦如此，后生日后踏上社会，走上工作岗位，面对纷纭复杂的大千世界，面对“多歧路”的人生之旅，又有谁去为他们理清标准答案？而社会、人生又怎么可能是一道只有唯一答案的选择题？劳心劳力学此屠龙之技，其作用何在？

在自然界，我们不会企求紫罗兰与玫瑰花散发出同一种芬芳，也不会希冀春兰与秋菊在同一时间开放。那么，我们又有什么理由将任何复杂的问题都归结为一种标准答案？而作为天地之精华、万物之灵长的人类，又怎么能让他们在童年、少年时期只有同样一副大脑、同样一种思想？我们的教育，已经到了为标准答案作出深刻反思的时候了。

教育问题谈